

中国日本学年鉴

ALMANAC OF JAPANESE STUDY IN CHINA

1949—1990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

中國日本學年鑑

1949—1990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 編

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京)新登字130号

中国日本学年鉴

1949—1990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编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北京广播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50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5023-1650-7/Z·271

定价：12.00元

顾问 刘德有 万峰 佐藤保

主编 李书成

副主编 周维宏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日平、马朝红、王成、刘晓方、朱维珍、任泽民、任晖、李书成、李国庆、宋国忠、宋金文、张龙虎、张景翔、张麟声、周维宏、光国华、洪庆华、郭连友、漆红、譙燕、翟东娜

「中国日本学年鑑」の 発刊を祝す

「中国日本学年鑑」の発刊に際し、国際交流基金を代表し心よりお祝い申し上げます。

近年日中間の交流は活発になり、政府や経済界関係者のみならず、多くの研究者・留学生が相互に両国を訪問しております。

両国間の学術・文化交流が進展するにつれ、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研究は益々活発となる一方、中国においても各大学、研究所等で日本研究が盛ん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そのような状況の中で、本年鑑の発刊は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を概観するものとして誠に意義深く、かつ時宜を得た企図であると思います。

また、このような重要な仕事が私ども国際交流基金と中国国家教育委員会の協議にもとづき設立致しまし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により行われたことは、同センターが着実に発展していることを示すものであり、当基金として大変よろこばしいことと存じます。本年鑑が、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の発展に資し、また日中両国の相互理解、友好親善に役立つことを念願致します。

最後に、本年鑑の作成にあたり中心となって編集の任にあられ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の李書成副主任及び関係の方々の御努力に敬意を表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国際交流基金

理事長 鹿取 泰 衛

贺 词

值此《中国日本学年鉴》创刊之际，我谨代表国际交流基金表示衷心的祝贺。

近年来，日中两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不仅政界、经济界的有关人士往来密切，两国的许多学者、留学生也交织互访。

随着两国间学术、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日本的中国研究愈发活跃；另一方面，中国各大学、各研究院所中的日本研究也盛行起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对中国的日本学研究状况的概述，本年鉴的发刊意义深远，而且甚合时宜。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是由我们国际交流基金和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协商创办的。现在中心完成了年鉴的编纂这一重要工作。它表明，该中心正脚踏实地稳步发展着，国际交流基金对此感到由衷的欣喜。我祝愿，本年鉴将有助于日本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有利于日中两国的相互了解和睦邻友好。

最后，谨向负责本年鉴编辑工作的日本学研究中心李书成副主任及诸位有关人士的努力表示深深的谢意。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

理事长

鹿取泰卫

编者的话

我们一些从事日本学研究和教学的同行，在进行选题写作和指导学生学习研究时，常感到资料的不足和贫乏。其实有关材料还是比较丰富的，只是缺乏系统的资料汇集罢了。因此，为了搜集某项有关资料，我们不得不用大量时间去翻阅数量庞大的原始材料，而这种手工业式的研究方法，显然难于适应当今现代化研究的需要；加上有些资料陈旧，信息不及时，以及处理交换系统的不完善（个别特定机构除外），使一般研究单位和个人很难及时了解同行们的研究成果，不能汲取最新资料，尤其是当年的。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日本学研究的发展。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给同行们提供些方便，遂产生了编写这部“年鉴”的念头。

非常高兴，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中日有关人士与广大学生的支持。于是，从去年底旋即组织人员，广泛收集资料，并组织编写，经八月，编成此书。

本书是中国人研究日本学的综合参考书，它介绍了我国建国四十年来国内学者研究日本学的各方面可喜成果，同时收集了中日关系在这个时期的重要资料及最新统计材料。深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工作，因此今后将有计划地陆续编辑出版，为促进中日文化的交流稍尽绵簿。

本书原是为日本学研究生编撰的，但它如能对其他从事日本学研究的同行提供参考、有所裨益的话，那将使我们全体编辑人员感到欣慰。

本年鉴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日本学中外有关专家学者的鼎力协助，他们不但为本书的编写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还亲自为我们撰稿。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实施委员会主任

王福祥教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鹿取泰卫先生均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这是本书得以如期出版的重要原因；我们特邀的三位顾问——刘德有先生、万峰先生、佐藤保先生对本书的内容、编排都给予热情的指导。在此，谨向以上各位先生以及热情帮助过我们的其他先生表示由衷地感谢！

编写一部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日本学研究综合年鉴并非一件易事，况且经验不足，时间仓促和材料限制，遗漏或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赐教。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书成**

一九九一年八月

贺词

鹿取泰卫

编者的话

李书成

目 录

一、建国以来日本学研究综述·····	1
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历史沿革综述·····万 峰	2
我国日语教学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刘耀武	22
新中国成立后的日本文学研究和翻译出版情况 ·····李 芒	36
建国四十年中日关系史研究综述·····杨正光	47
新中国学术界对日本政治与法的研究·····田 桓	71
日本哲学研究四十年·····卞崇道	103
建国以来我国的日本教育研究·····苏 真	135
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概况·····王仲全	154
二、中国日本学团体、机构和主要刊物·····	166
(一)日本学领域文学学术团体单位一览·····	167
(二)日本学领域研究机构简介·····	174
(三)日本学领域期刊杂志简介·····	196
(四)日本学领域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一览·····	202
(五)日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一览·····	203
(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专科设置单位一览	204
(七)成人教育高等学校日语专业设置单位一览·····	206
(八)全国高等院校公共日语教研室设置一览·····	207

三、建国以来日本学研究的主要著、译作目录·····	220
(一)著作部分·····	221
1、历史·····	221
2、政治·····	224
3、日本社会·····	225
4、法律·····	226
5、中日关系·····	226
6、军事·····	236
7、经济·····	236
8、文化·····	240
9、科学技术·····	241
10、教育·····	242
11、体育·····	243
12、日语教材·····	244
13、文学·····	274
14、艺术·····	276
15、人物传记·····	278
16、工具书·····	279
(二)译著部分·····	283
1、历史·····	283
2、政治·····	287
3、日本社会·····	290
4、法律·····	292
5、中日关系·····	293
6、军事·····	297
7、经济·····	297
8、文化·····	306
9、科学技术·····	307
10、教育·····	308
11、体育·····	309

12、日语教材·····	309
13、文学·····	312
14、艺术·····	344
15、人物传记·····	346
16、工具书·····	349
四、建国以来中日学术交流大事记·····	349
五、建国以来中日关系大事记·····	410
六、附录·····	457
(一) 日本国宪法·····	457
(二) 日美安全条约·····	465
(三) 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469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472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	474
(六) 日本主要长期统计·····	491
(七) 日本主要地方统计·····	515
(八) 日本地方生产统计·····	536

一、建国以来日本学研究综述

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历史沿革刍述^①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

万 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日本学年鉴》(以下简称《年鉴》)第一卷,出版了。这是我国第一部日本学研究年鉴。毋庸置疑,它的问世,将有裨于我国的日本学研究的开展。鉴者,镜也。以年鉴形式登录和披露历年的研究成果,就宛如一面镜子能反映我国日本学研究的成果,供人们阅览。不仅如此,年鉴还可以是一个“晴雨表”,它能显示若干年度或某个时期我国日本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大家知道,编年鉴要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这就是,有关的事业必须是有坚实的基础和发展前途,而且有持续稳定发展的一定条件。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年鉴》,依我看,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前提,才得以应运而生。笔者对这部年鉴的出版,谨表热烈的贺忱。

日本史研究是我国日本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帮助《年鉴》读者了解有关情况,本文拟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学者研究日本史的沿革作一点简要的刍述。借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日本史研究的起步、发展、停滞、再发展的历史过程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并且按历史形成的脉络,揭示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日本史研究的走向及其侧重所在,还要尽可能充分地展示日本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及其丰硕成果。总之,本文试图对《年

^①本文所叙述的范围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学者的日本史研究为限,不包括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学者。本文所叙述的时间限于新中国成立后至现在,不涉及解放前旧中国。

鉴》第一卷所收录的时期内我国日本史研究成果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科研的内涵作一点粗浅的“解说”。能为《年鉴》的日本史研究部分献上“画龙点睛”的一笔，是拙文在所企及的。如有不妥或错误之处，还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二)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迄今，我国日本史研究事业走了一条颇为坎坷曲折的道路。搞历史研究，总离不开历史分期。作为迄今为止我国日本史研究的历史，也可以按它的阶段性划分为几个历史时期。因为这里不是专门探讨我国日本史研究史，所以我想只是大致作一个分期。这就是以“文革”结束和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划分两大时期，在这以前，又可以划分两个时期，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发动为止，二是从1966到1978年。前者即所谓“十七年”，后者是十二年，其中整个“文革”时期为十年。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日本史研究和其他事业一样都处于中断、挫折和停滞状态，所以，本文对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日本史研究状况的阐述，以前“十七年”那个时期为主，对“文革”及其结束期的情况，不想花费什么笔墨。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夕的“十七年”，时间不算短，但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史学来说，还只不过是一个“草创”或者“奠基”时期。众所周知，新中国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胜利后诞生的。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民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学建设这一重要事业，都需要“白手起家”从头做起。而“十七年”里，在内部由于政治运动频繁，特别是文教界等部门忙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艰巨任务等等。在外部，则有二次大战后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局面（间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等局部热战），特别是中日邦交长期未获正常化，等等。加之，学术指导思想上的极左思潮影响（“文革”中是大泛滥），致使日本研究包括日本史在内，设置了一些莫须有的人为的“禁区”。这一切都大大束缚了日本

史研究者的头脑，严重阻碍了我国日本史研究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史学的建设。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七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整个时期我国日本史研究成果不多的主要背景。据我手头掌握的很不完全的统计资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学者、专家出版的有关包括日本史、日本问题、中日关系史等在内的书籍大约只有二十余种，有关日本史的像样的论文也只有十多篇。而翻译日本、苏联及美、英学者所写日本史著作则有四十余种之多。从我所掌握的资料可以看出这样几点：第一、那个时期我国日本史研究还刚刚起步，介绍国外日本史研究成果多于自己的研究成果。第二、有关日本史问题的论文虽然为数不多，但出现了对本日本史研究处于学术指导、带头地位的重要论文。比如周一良的《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吴廷璆的《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明治维新和维新政权》，便是杰出的例子。第三、那个时期出版的书籍中，作为史学著作的日本史专著则寥若晨星。其中，朱谦之的《日本哲学史》、《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日本的朱子学》，作为专史、专题著作，是有相当份量的。第四、当时还有出自国际问题研究家、评论家和日本问题研究家之手的著作。由于我国国情和历史条件所致，这方面的学者、专家，同样是日本史学建设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著作，对于初创时期的我国日本史研究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想特别提到已故的两位老前辈刘思慕和李纯青。前者著有《战前与战后的日本》（1950）等书，后者著有《日本问题概论》（1954），这些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还有，张香山的《日本》一书（1954）。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而知名的专家学者王芸生，在这个时期也发表了有关日本外交史问题的论文（1965）。第五、在日本史的著作数量稀少的情况下，世界史的书比日本史的多。世界史的书有：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由国内高等院校历史系教师参加编写的《世界通史》（1962）、周一良《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1955）、王辑五《亚洲各国史纲要》（1957）、

朱杰勤《亚洲各国史》(1958)、周一良《亚洲各国古代史》(上册, 1958)、何肇发《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1958)等等。这些世界史著作虽然反映那个时期包括日本史在内的国别史研究成果,但多是为高等院校编写教材的。总之,从世界史的书多于日本史的情况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五六十年代我国日本史更多地作为世界史的一个分支,而尚未建立起体系完整、独立的日本史学。

讲到五六十年代我国日本史研究情况,值得特别提到的是:一、建立我国马克思主义日本史学的主阵地,是在高等院校。二、当时在高等院校执教、作为学科指导者和带头人的老一辈史学家,如北京大学的周一良教授、南开大学的吴廷璆教授,以及东北师范大学的邹有恒教授、复旦大学的吴杰教授等,无论在教学或科研,也无论在五六十年代或是现在一直都在为我国日本史学的建设作出杰出的贡献。如今他们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日本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三)

1976年“文革”终于结束,1978年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整套方针路线。我国的日本史研究者,在科学和思想上双双获得解放。春风化雨,我国的日本史学的建设迎来了百花吐艳的大好局面。新时期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在日本史的教学和科研恢复与发展的同时,从中国社科院到各省市自治区社科院以及各地高等院校都纷纷成立了日本研究机构。不仅如此,我国还成立了中国日本史学会(1980~82年称为日本史研究会)。该会已拥有会员不下三百人,并设立了古代、近代、现代、战后和中日关系等五个分会。学会团结广大同仁,积极组织学术交流和讨论等活动,并推荐出版大批研究成果。除了中国日本史学会外,我国还有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和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等学会组织。在研究机构和

学会组织建立的同时，还创办发行了各种研究日本（包括日本史在内）的刊物。它们为日本史学的建设积极提供园地，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第二、日本史研究队伍在不断扩大。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前述老一辈日本史研究家的高足们，在从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已经逐渐步入中老年期。他们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成熟起来，担当起日本史学科的带头人和指导力量。在党和国家决定恢复培养研究生制度后，他们和老一辈日本史研究家一道担任硕士生指导教师（个别人已是博士生指导教师）。就这样，在八十年代涌现了一批有相当实力的日本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日本史研究者的队伍在扩大，新老衔接的梯队在形成。这就保证了八十年代日本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第三、由于贯彻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外特别是与日本学术界的交流不断发展和深入。请进来，走出去，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不断地到日本去进修、考察和进行专题研究。日本学者也以各种方式应邀到中国来执教和讲学。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还有机会参加有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打开眼界，寻求知识，结交了朋友。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的结果，使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得以及时地、系统地、广泛地吸收国外（主要是日本也包括美、苏等国）日本史研究的新成果。而且，通过实地考察，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还有机会接触并收集到许多宝贵的第一手和权威性史料。上述种种，对提高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水平和日本史学建设都大有裨益。

在七十年代末到今天这段时期里，我国日本史研究的成果空前丰硕，堪称琳琅满目。从已出版的著作来看，通史有两种，即辽宁大学哲学研究所编写的《日本简史》（1978）和赵建民、刘子芳主编的《日本通史》（1989）。断代史有四种。其中，古代有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1984）；近现代史有万峰《日本近代史》（1978年初版、1981年增订），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1984）和万峰、沈才彬编《日本近现代史讲座》（1987）。专史著作有四五十种之多。其中有：汪向荣《邪马台》（1982），伊文成、王金林主编《日本历史人物传（古代中世纪）》（1984）、